



# 乡土社会动员

——近代湖南的思潮丕变与社会救赎(1840~1927)

姚曙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乡土社会动员

——近代湖南的思潮丕变与社会救赎(1840~1927)

姚曙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社会动员:近代湖南的思潮丕变与社会救赎  
(1840~1927) / 姚曙光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305-15968-8

I. ①乡… II. ①姚… III. ①社会发展史—研究—湖  
南省—1840~1927 IV. ①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066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乡土社会动员——近代湖南的思潮丕变与社会救赎(1840~1927)  
著 者 姚曙光  
责任编辑 严若城 蔡文彬 编辑热线 025-38686531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9.5 字数 352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968-8  
定 价 44.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前言

本书主要研究近代湖南思潮的丕变、乡土社会动员及其互动关系的历史。

透过纷繁的历史表象,人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湖南现象”,即在社会转型时期湖南乡土社会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典型的历史征象,包括湖南在中国政治历史地图上的隆起,湖南创造自身悠久文化发展的高峰,湖南在封建政治制度和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主观努力及巨大历史作用等方面内容。其中,社会与思想史标本形式的完整、本质内容的激进、湖南主体意识的凸现、历史影响的深远以及实际社会效果的反差等为湖南历史现象的重要表征。

学术界着力于湖南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的成果不多见,而注重于乡土社会动员的系统研究则暂付阙如。本书的研究路径是试图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结合起来,力图透过纷繁复杂的思想表象,深入乡土社会底层,从湖南思想发展的肌理脉络和代际递嬗方式着手,宏观把握湖南近代社会思潮的丕变,认知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共性与特性。

本书的基本理论预设,是社会思潮与社会动员的对立统一关系。所谓社会思潮,是指呈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空,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在某些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在常态下一般表现为稳定的渐变渐进方式,但在社会转型时期则会以丕变和起伏波动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谓社会动员,是指特定区域的某些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受社会思潮的启发触动,因缘时势,试图以部分或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去改变或维护社会面貌的社会性行动。本课题探讨湖南近代社会动员早期的历史,因其始终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展开的社会动员,故笔者名之曰乡土社会动员,作为研究湖南社会转型的一个切入点。

本书的时间区段划定在1840~1927年之间,笔者认为,在这个时间区段,湖南乡土社会动员经历了从自发到逐步自觉到进入高潮的一个完整过程,应该说,1927年以后,湖南乡土社会动员进入了一个新的回合。

按照这一逻辑框架,本书分八个单元进行叙述。在导论部分,概述了湖南

乡土社会的本色,这是近代湖南历史展开的社会基础;第一章、第二章讨论了经世致用的湘儒学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以及在儒学思想引导之下的各社会力量卫道救时的社会动员;第三章、第四章全面考察了西学在湖南流布的历程,湖南对西学的逐级接受与融通,并梳理了西学在湖南社会引发的改良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第五章、第六章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社会的传播、湖南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体认与创造,以及在国民革命思想指引下,湖南农民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在余论中,以“三个代表”思想作为衡量和评判近代湖南思潮丕变与社会动员历史的根本尺度,总体评述了湖南乡土社会转型的历史,认为:通过发扬儒学的内圣外王、经邦济世功能,通过吸收西学的民主科学思想,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湖南演绎了热土潇湘的光辉历史,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湖南近代思想存在儒学盛、西学弱、马克思主义偏三个特点,制约了湖南历史的发展呈现出社会动员的乡土性。正反两方面的综合,造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湖南现象。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主旨所在。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在方法上,采用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方法,尝试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进行乡土社会转型历史的研究;二是在研究对象上,以湖南区域社会为个案,将新旧民主革命时期整体贯通,把乡土社会动员放在一个层垒的历史场景中,考察其内在联系与演变发展的轨迹;三是在研究内容上,兼顾湖南历史的正面与负面,透过湖南近代历史的表象挖掘其本质,揭示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标本意义;四是在整体历史阐述过程中,不囿于成见,以递进的“乡土社会动员说”突破与湖南历史不完全吻合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弥补“湖湘文化决定论”和“(资本主义)现代化解读模式”的偏失,以求对近代中国“湖南现象”和近代中国历史进行新的研究。

著者

# 目 录

|                      |    |
|----------------------|----|
| 导 论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湖南现象及反诘  | 1  |
| 一、近代中国的湖南现象及其诘问      | 1  |
| 二、选题的学术价值、研究路径和研究前史  | 6  |
| 第一章 湖南经世实学对儒学的复兴     | 15 |
| 第一节 耕读文明：湖湘文化近代历程的基础 | 15 |
| 一、近代湖南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      | 17 |
| 二、近代湖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21 |
| 三、近代湖南社会与文化          | 27 |
| 第二节 崇儒重道的乡土社会        | 33 |
| 一、高在“形上”的儒学          | 34 |
| 二、沁入心田的礼俗            | 37 |
| 第三节 晚清湘儒学群体思想的流变     | 42 |
| 一、明清之际湖南实学思潮的崛起      | 42 |
| 二、嘉道经世儒学的昂扬          | 47 |
| 三、咸同经世致用的湘儒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 54 |
| 第二章 卫道救时的传统乡土社会动员    | 61 |
| 第一节 湖南乡土社会的急促军事化     | 61 |
| 一、战火的洗礼              | 61 |
| 二、奋起行伍的乡民            | 65 |
| 第二节 全面失范的乡土社会        | 72 |
| 一、难以重整的河山            | 72 |
| 二、救世卫道的地方团练          | 75 |
| 三、铤而走险的秘密社会          | 80 |
| 四、反洋教的乡民             | 86 |

|                             |     |
|-----------------------------|-----|
| 第三章 湘学对西学的梯级接受与融通 .....     | 97  |
| 第一节 从内圣外王到师夷制夷的长时段转折 .....  | 97  |
| 一、湖南西学流布的时差 .....           | 97  |
| 二、姗姗迈入西方器物文明门槛 .....        | 101 |
| 第二节 西学中用的湖南洋务思潮 .....       | 107 |
| 一、从经世致用到师夷致用的转变 .....       | 107 |
| 二、早期维新思潮中湖南的沉寂与踟蹰 .....     | 111 |
| 第三节 激荡的湖南西学维新思潮 .....       | 121 |
| 一、忏悔意识·危机意识·变革意识 .....      | 121 |
| 二、西学经世与西体鼎革 .....           | 125 |
| 第四节 湖南排满思潮的勃兴与革命思想的滥觞 ..... | 139 |
| 一、取道日本的湖南西学 .....           | 139 |
| 二、排满思潮的勃兴与湖南激进革命思想的滥觞 ..... | 140 |
| 三、革命激情与政治理性的冲突 .....        | 150 |
| 第四章 维新变政和排满革命的社会动员 .....    | 159 |
| 第一节 重“变政”轻“变器”的维新动员 .....   | 159 |
| 一、官绅的动员与民众力量的沉默 .....       | 159 |
| 二、官绅实业之强与民办实业之弱 .....       | 162 |
| 三、“改良”的退隐与“革命”的凸现 .....     | 164 |
| 第二节 湖南自立军的转折与新趋向 .....      | 165 |
| 第三节 湖南革命派的践履力行与社会动员 .....   | 170 |
| 一、革命派与湖南会党 .....            | 170 |
| 二、革命风潮弥漫三湘七泽 .....          | 172 |
| 三、举义旗于万夫 .....              | 175 |
| 第五章 湘学对马克思主义的体认与创造 .....    | 181 |
| 第一节 最后觉悟之伦理新文化 .....        | 181 |
| 一、蛰伏的社会主义思潮 .....           | 181 |
| 二、进逼道德伦理层面的理性批判 .....       | 184 |
| 第二节 劳农专政的马克思主义 .....        | 188 |
| 一、新民学会的求索 .....             | 188 |

|                               |         |
|-------------------------------|---------|
| 二、唯物史观与劳农专政 .....             | 196     |
| 三、理论遭遇历史的矛盾 .....             | 201     |
| 四、直面悖论：李达“还原”马克思的努力 .....     | 212     |
| 第三节 国民革命思想的理论建构 .....         | 217     |
| 一、国民革命的强势话语 .....             | 217     |
| 二、国民革命与农民革命 .....             | 229     |
| 第六章 国民革命话语体系下的乡土社会动员 .....    | 239     |
| 第一节 运动农民：从边缘进入中心 .....        | 240     |
| 一、在犁头旗帜之下 .....               | 240     |
| 二、农民成就千年奇勋的再审视 .....          | 247     |
| 三、白色恐怖的肆虐与社会经济的颓废 .....       | 260     |
| 第二节 农民的理性 .....               | 265     |
| 一、集体的兴奋与多数人的暴政 .....          | 265     |
| 二、农民的理性 .....                 | 272     |
| 第三节 不期而至的民粹主义 .....           | 276     |
| 一、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 .....             | 276     |
| 二、涌动于乡土社会动员中的民粹主义 .....       | 281     |
| 余 论 近代湖南乡土社会转型的矢量分析 .....     | 286     |
| 主要参考资料 .....                  | 295     |
| 后 记 .....                     | 302     |
| 附 录 遥寄仙岛 追怀同道——姚曙光博士周年祭 ..... | 余三定 304 |
| 出版说明 .....                    | 余三定 306 |

# 导 论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湖南现象及反诘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①</sup>这是费孝通先生 1947 年出版的《乡土中国》第一节“乡土本色”中的第一句话，是对近代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本质概括。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变迁，是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湖南近代历史主体即是在这种乡土社会基础上展开的，湖南近代一百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演绎，是乡土本色的湖湘文化现代性转换与乡土社会动员交互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湖南所有历史事件与人物无不留下一块或大或小的乡土社会的胎记。

## 一、近代中国的湖南现象及其诘问

### 1. 近代中国的湖南现象

有论者在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反思的时候，感到中国有三个地区于全局的影响至深至巨：第一是粤闽地区，它作为中国的门户，在接受信息、输入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当然也包括遭受外来侵略与蹂躏）处在领先的地位；第二是江浙地区，它处在长江下游富庶之乡，由于生产发达，实力雄厚，成为中国近代经济的火车头；第三就是湖南，它主要不是以信息和新观念、亦不是以经济实力，而是以其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文化的社会功用，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和其他领域的变化。<sup>②</sup>

这段话的确揭示了近代中国和湖南历史的特殊状况。虽然我难以苟同其地区影响力的排序，也不完全同意其关于湖南“士人”发挥文化的社会功用之说。我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时段，中国近代政治地图上的湖南占有首屈一指的特别重要的地位。概而言之，其一，湖南历史，以其贯穿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并发挥独特的历史作用而成为不可多得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标本；其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 页。

② 罗福惠：《近代湖湘文化鸟瞰》，载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 年，第 372 页。

二,湖南思想史,以其完整参与中国社会思想由古至今的新陈代谢而堪称仅有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缩影。回望一个半世纪的近代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引人注目的近代“湖南现象”。

在历史的进行时,湖南就已经被寄予厚望,梁启超在鼓动维新时说过:“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藪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sup>①</sup>

陈独秀的《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影响较大。他引用杨度的名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开头,探讨“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他认为是“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是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陈独秀用牺牲自我的蚂蚁造桥过河的寓言故事来歌颂湖南人卓立敢死、舍生取义、坚毅顽强、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sup>②</sup>

学者们更注意到湖南现象。谭其骧用平淡的语气道出了惊诧世人的现象:“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sup>③</sup>下面一系列统计数字颇能说明近代湖南的人文蔚兴,人才辈出的概况。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所载入的2993位近代以前的历史名人中,湖南籍只有23人,仅占0.77%,在载入《二十四史》的5783位历史人物中,湖南只有55位,占0.95%。<sup>④</sup>清朝以后,情况彻底改观。《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词典》<sup>⑤</sup>一书列举了1840~1988年间的9904位人物,湘籍达893位,占总数的9%;《辞海》<sup>⑥</sup>列举了659位人物,湘籍84位,占12.75%;《中国现代人物传》<sup>⑦</sup>列举了240位人物,湘籍49位,占20%。另据胡兆量所撰《我国武将地理分布初探》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6页。

②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480~481页。

③ 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学年报》,第一卷,第4期。或见《长水集》,《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2页。

④ 郭辉东:《湖湘文化与湖南人才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见周秋光主编:《湖湘文化宏观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⑤ 李盛平等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

⑥ 《辞海》编委会,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⑦ 王永均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一文统计,列举民国将领 434 位,其中湘籍 72 位,占 16.59%,统计红军、解放军将领 345 位,其中湘籍 102 位,占 29.57%。<sup>①</sup>据郭辉东统计综述: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 79 人中,有湘籍 20 人;同盟会最初两年会员可考者 976 人,湘籍 158 人;1904 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中国留日学生 2 395 人,湘籍 373 人;1919~1920 年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者约 1 600 人,湘籍达 346 人;在《壮哉,黄埔——黄埔军校大纪事》所列的 330 名黄埔名将中,湘籍 81 人,占 24.5%;在 1955 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54 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湘籍有 73 人,占 28.7%;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 52 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 10 人,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17 名政治局委员中,湘籍有 7 人……<sup>②</sup>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概括,湘籍人物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因子”超过了 20%。

嘉道以来,湖南豪贤崛起,功业日盛。经世改革、同光中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自立起军、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创建中共、国民革命、武装割据……几乎每一个影响全局的近代历史事件都有湖南省正反面的历史地位,几乎中国近代每一场重大的历史运动都有湖南人的身影,几乎每一种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走向的思想都有湖南人的声音。近代湖南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历史现象,久已为海内外、学界内外、俚俗上下广为注目,并分别做出了各自异趣的现象学解释与分析。

透过纷繁的历史表象,笔者认为:所谓近代中国的湖南现象,即指在社会转型期湖南乡土社会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典型的历史征象,包括湖南在中国政治历史地图上的隆起,湖南自身悠久文化发展的高峰,湖南在封建政治制度和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主观努力以及产生了巨大历史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社会与思想史标本形式的完整、本质内容的激进、湖南主体意识的凸现、历史影响的深远以及实际社会效果的反差等为湖南现象的重要表征。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后发展的民族国家,所谓社会过渡,本质上是从自然经济占主导的传统农业文明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所谓思想过渡,主要是从封建儒家文化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过渡。这样一种社会的、思想的过渡也就是社会、文化转型。具体到中国乡

① 胡兆量:《我国武将地理分布初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3 年第 2 期,第 57~59 页。

② 郭辉东:《湖湘文化与湖南人才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见周秋光主编:《湖湘文化宏观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83~284 页。

村社会的转型,应该是指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乡社会的转变过程。转型的目标是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从传统的宗法封建的乡村社会向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的转变,是从传统的缺乏自觉意识的保守的农民向作为历史主体的开放的农民转变。也就是传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性转变。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所谓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世俗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湖南现象就是湖南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文化现象。

汤一介先生指出:“文化转型时期绝不是一个短的时期,春秋战国到西汉儒家成为正统,定于一尊,是经过了三四百年;魏晋到隋唐也经过了三四百年;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因此可能还得有一个相当的时期,中国文化才可以走出转型期,形成新的文化传统。”<sup>①</sup>结合湖南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与客观现实,在大部分人口依然居住在农村,以农产品为主要生产、生活资源,镰刀依然是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浩浩荡荡的进城打工大军年复一年候鸟般往返奔波于城乡之间又难以断根泥土、融于城市,耕读依然是农民人生主体内容并关键性地决定其社会流动能否实现的前提下,农民作为社会底层的整体结构形态并未根本改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依然是千百万农民美好的梦想与奋斗目标,湖南的社会转型仍在进行中。一句话,湖南乡土社会农民的历史远未终结。当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最终完结,近代以来形成的“湖南现象”才会失去其现实意义。但谁又能否定这一现象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呢?

## 2. 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诘问

湖南近代思想史,本质上是湖南人觉醒、抗争与谋求发展的认识史,是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湖南人自强以强国、自救以救民的思想历程;近代湖南思想深深受到全国各区域、各流派思潮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走向与行程,这种思想的互动,其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刻,在近代中国各省区中不多见;近代湖南思想从古代封建思想中挣扎出来,形成了一个总体上从低到高、思潮回旋交错、有湖南特色的精神体系,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湘一儒学”、“湘一西学”和“湘学马克思主义”,三者共同构成近代湖南思想史的主体内容。近代湖南思想史其标本的代表性、完整性和研究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也不多见;近代湖南思想史是与社会史相伴相随、互为

<sup>①</sup> 汤一介:《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载《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6~37页。

因果前提、交互演进的,思想的嬗变与创新导致社会的动员与进步,社会动员与发展促进思想的普及与飞跃。

有些享受着当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学者,以现代、后现代浮华世界的视点,以后见之明的口吻和时下流行的新锐话语体系,去指责批评处于近代、前近代的历史活动主体因痛苦而挣扎、因不屈而抗争的历史行为为激进主义,无视“后发”的中国在外来挑战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他们的批评好比说:一个被捆绑起来的人应该跟着队伍前进,而且能够跟上队伍;试图用刀子割开绳索或去攻击那些曾经捆绑过他、当时还在阻挡他前进的人,是激进主义;仿佛广大乡村农民因为挣开束缚而招致的自身某种程度的伤害是过激主义的咎由自取,是几代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根源。20世纪末,少数历史虚无主义论者,采取“翻烧饼”式的方法,进行历史大翻案,抛出“告别革命”论。他们声称,由于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走上了人民革命思想引导的“激进主义”之路,所以出现了“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近百年的中国史“变成了一部不断地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从1919~1978年,曲折起转之间,“轰动”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所以,他们主张,应当使革命成为一个贬义词,应当反对革命的一切后果。因为束缚的失去而导致暂时的失衡与无序(如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后引起的“国家重建危机”)是这段历史的必然结果。要反思、要超越、要告别。<sup>①</sup>

而一些脑袋里充塞着“革命”术语和理论的学者,固守着传统的话语体系,将历史描绘为一幅一成不变的老面孔。他们不仅在新锐们的辩论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不能回答“为什么是湖南”、“湖南有什么缺陷”等问题;而且往往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改革实践中显示出学术的窘迫处境,难以回应时代的拷问和论辩对手的盘诘,特别是不能完满地回答关于近代中国“湖南现象”历史价值与实际社会效果的诘问,不能解释现象之下掩盖的本质。

不巧,近代湖南正是这种“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策源地与愈演愈烈的“实验场”。近代湖南也并不因此而在社会转型与发展方面领先于全国。

如果讨论始终聚焦于“革命”的“有理”与“无理”层面,颂扬革命讴歌革命则革命的缺陷被掩盖或成为盲点,否定革命贬斥革命则革命被当作动乱、洪水猛兽、过激主义而遭根本摒弃、无情告别。总之,革命演变与发展的内在理路,

<sup>①</sup> 以上“告别革命”论点转引自周振华《应当十分珍惜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求是》2000年第16期。

革命中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过火行为等未能得到检视,历史就会成为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本书试图重回湖南传统乡土农业社会的历史情景中,在充分把握国内外条件变化的基础上,从湖南文化积累和乡土社会内部的变迁入手,考察湘一儒学的方向与缺陷,湘一西学的路径与肤浅,湘学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偏颇,全面描述纷繁复杂的西方各种思想流派与湖南乡土社会的省情民俗、文化传统所发生的或浅或深、或畸或正的融合及流变;通过剖析近代湖南以农民为主体的三次社会动员,即卫道救时反教的乡土社会动员、维新排满民族革命的乡土社会动员、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社会动员,回答关于近代湖南现象的历史诘问,进一步探寻激进主义之源,求索民粹主义之根;讨论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农业社会初度转型的成功与失败;对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镰刀图案予以深情的注视和理性的阅读。

## 二、选题的学术价值、研究路径和研究前史

### 1. 选题的学术价值

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来研究湖南近代思想的嬗变有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概括起来有两个大的方面:其一,对于重新认识历史有重大意义;其二,对于当今社会转型的方位认定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探究有指导意义。下面将分别简述其要。

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展开湖南近代历史研究,似乎具有一种话语转换的意义。西方学者在战后探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时,遇到了难解的困惑,他们就试图从中国底层社会乃至秘密社会入手,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在近代中国的“反叛—革命”的关系链中探询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施拉姆和裴宜理可以说是在此领域做出成就的典型代表<sup>①</sup>。笔者在这里所指称的“话语转换”,一方面是区别于滥用“人民革命”的革命史学话语,正如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H. Murray)以旁观者身份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学者对于几乎所有的国内动乱一直都抱着一种僵化的观点,即视之为‘正义性质的农民起义’和导致1949年共产主义胜利的原始革命传统的真正动力。这一习惯导致了一种将各类动乱的政治性质戏剧化的倾向,甚

<sup>①</sup> 参见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and Secret Societies*, China Quarterly, No. 27, July—September, 1966.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至将最原始形式的骚动也视为不同程度的自觉反抗清政府的起义先声。”<sup>①</sup>另一方面,也区别于精英史观,是一种小草翻身、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学方法。

湖南和整个中国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产生以来,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构成了中国跨越三个世纪的“三农问题”。毛泽东很早就认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sup>②</sup>邓小平也确认:“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sup>③</sup>江泽民指出:“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sup>④</sup>笔者服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根据对中国国情的了解特别是对农村发展状况的调查,笔者认定,中国社会的转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至少在湖南,情况会是这样。

不论历史被历史学家们以何种标准分为多少不同的时段,农民依然是那些农民,祖祖辈辈传衍下来,从趋势来看,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繁衍存在下去。仔细地整体研究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的转型是历史学义不容辞的一个重要课题。已故的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几乎构成了人口的全部。从农民人口数量和所占比例,说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是不算十分片面的。湖南迄今仍是农业大省,当中国无数的领域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嬗变时,我们的农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着千年的传统。在国外,“农民学”(Peasantology)一词作为术语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此后,国际上出现了“农民学”的辉煌,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可以和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发现相比拟<sup>⑤</sup>。在这一时期,国外关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先有萧公权的《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该书基本结构围绕着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

① (美)穆黛安著,刘平译:《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2页。

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④ 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农民日报》,1995年2月28日。

⑤ T. Shanin, *Peasant and Peasant's Society*, Oxford, 1987.

控制体系展开,重点论述了乡村控制所包括的四大体系,即警防的保甲体系、赋税的里甲体系、救助的社仓和其他救治组织、意识形态控制体系即教化的乡约和其他组织。接着有黄宗智的《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译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译版)、《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译版),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译版)和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译版)等。可见,研究近代历史,特别是湖南近代历史,着眼于农村社会是完全必要的。

## 2. 关于本课题的研究路径

新时期中国史学复兴以来,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社会与思想互动模式诠释中国思想现代转型的长程思想史研究,使现代化叙事逐渐取代传统的革命史叙事,成为主流范式,历史被重新赋予丰满形象,还原为血肉之躯。但历史学的这一代谢和承启过程才刚刚开始,远未修成正果。刘泽华在《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一文中指出:“研究思想史者主要是研究思想家的文本、思想逻辑、学术传承和抽象继承,相对而言,很少注重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而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又是社会的实体问题,相对来说,疏于与思想的结合。”就实而论,思想与社会本应打通,他认为,这似乎尚未引起充分的注意。他还说,“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该说是历史研究中一个常青的课题。从历史本身看,两者一直处于互动之中,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样,轮番不已,引起了历史的跌宕起伏”。有人说历史是思想史,有人说历史是社会史,无疑都各有道理。这是因为,思想与社会确实可以二分,尤其在研究时更可以作认识性的学科划分。但就历史本身而言,两者是结为一体的,以至可以说两者互为表现,是一种历史的本体。<sup>①</sup> 研究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不是思想研究与社会研究的机械相加,而主要是探析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具体地说,一是研究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问题;一是研究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近代以来,就湖南区域历史发展的社会史研究和湖南文化自身演变轨迹的思想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着力于湖南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而注重于乡土社会动员的系统研究则暂付阙如。本书试图把湖南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

<sup>①</sup> 刘泽华:《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

以代表人物为中心的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结合;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湖南近代社会思潮的丕变,透过纷繁复杂的思想表象,深入乡土社会底层,从湖南思想发展的肌理脉络、文化转换系列和代际递嬗方式着手,探询思想层面和社会层面交互影响互相渗透的复杂性,认知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共性与特性。

本书的基本理论预设,是社会思潮与社会动员的对立统一关系。所谓社会思潮,是指呈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空,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在某些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具有大众性、思想性、流布性、能动性等特点;符合社会进步方向的社会思潮能鼓舞大众情绪,提升大众的政治愿望,促进积极社会动员从而引导和推动社会发展,保守的社会思潮和过于激进的社会思潮则不能促进积极社会动员或会招致消极社会动员;社会思潮在常态下一般表现为稳定的渐变渐进方式,符合人类主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但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矛盾冲突激化的情势下或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作用下,社会思潮会以丕变和起伏波动的方式表现出来。

思潮受社会运动的启发、修正、检验。相对于历史的阶段性来说,思想观念有自身的传承性、独立性,因而构成思潮自身发展的某种特殊历程。以作为时代主导意识的理论形态的变化为演进标志的思潮史往往不能与社会历史的分期完全一致;不同区域的思想观念也常常出现或超前或落后于现实或外界的现象,各自区域思潮的发展也会有特殊历程。

梁启超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sup>①</sup>这就是说,没有离开社会基本群体而独立存在的社会思潮,当然社会群体的社会活动也在一定的社会思潮引导下展开。

所谓社会动员,是指特定区域的某些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受社会思潮的启发触动,因缘时势,试图以部分或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去改变或维护社会面貌的社会性行动,社会动员是社会思潮与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高度聚合与释放。社会动员按其与社会发展方向的相关性可分别为正动员和反动员、顺动员和逆动员、积极动员和消极动员、理性动员和非理性动员等;社会动员按其动员性质可分为工业社会动员、革命社会动员、战争社会动员等。本书探讨湖南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近代社会动员早期的历史,因其始终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生发展开的社会动员,故笔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第11页。